

意外的插曲與危機： 周恩來對伍豪事件因應的研究*

林 威 杰**

摘 要

伍豪事件是中共黨史中一次意外的插曲，是周恩來政治生涯的危機。整起事件起因源自於顧順章的「叛變」，進而導致大批共產黨人遭到逮捕。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的張冲，從那些「自首自新」的共產黨人供詞獲悉伍豪係周恩來化名。為了打擊中共黨內忠誠，張冲製造了周恩來脫黨的假象，以此分化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來勢洶洶，周恩來如何應對這場危機？如何重建中共特科來懲戒「叛徒」？整起事件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反而在數十年後引起一場政治風暴。那麼，周恩來又如何來捍衛自己的晚節？這些問題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周恩來、張冲、顧順章、黨內忠誠、特務

* 本文得到兩位匿名審查者和北京大學歷史系盛差偲博士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以表感謝。又本文係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中統局與國民黨的派系政治」（19wkpy45）階段性成果之一。

**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講師

投稿日期：2020.06.16；最後修訂日期：2020.10.17；接受刊登日期：2020.12.30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七十期

壹、前言

1931 年是中共關鍵年份，在這一年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國際派¹的上臺激化了黨內路線分歧。顧順章²（1904-1935）的「叛變」使得中共面臨生存危機，導致大批共產黨人被捕。緊接而來的牛蘭事件³、總書記向忠發（1880-1931）遭捕殺與伍豪事件等都是顧案的延續，其中伍豪事件更是影響周恩來（1898-1976）深遠的政治危機。有趣的是，這則〈伍豪啟事〉在當時看似意外的插曲，但所引發的危機卻是在幾十年後。伍豪事件大致可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 1932 年由張冲（1904-1941）所設計的脫黨啟事；第二階段則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用來攻擊周恩來的政治武器。

伍豪事件係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以下簡稱調查科，「中統」前身）對付中共的策略之一。作為回應，伍豪事件最終在時任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1906-1977）等人努力下暫時得到解決。不過以往研

¹ 指中共黨內一批曾經留學蘇聯的職業革命家，如王稼祥（1906-1974）、陳昌浩（1906-1967）、沈澤民（1902-1933）和夏曦（1901-1936）等人，這些人均與王明有密切關係，是所謂國際派人物。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上冊，頁 275。

² 顧順章 1923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聯俄容共期間擔任共產國際駐廣州代表鮑羅廷（Михай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秘密侍衛，1928 年中共六大後當選中央委員兼特務工作負責人，1931 年 4 月 25 日在漢口被捕，並隨即「叛變」。〈中共特務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顧順章簡歷〉，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 年 12 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頁 60。

³ 1931 年 6 月 15 日，共產國際在上海組織遭到破獲，交通系統負責人牛蘭（Hilaire Noulens，1894-1963）等人被捕。因牛蘭非中國人導致情況尤為複雜，進而引發國際聲援行動，是為牛蘭事件。也正因為此次事件讓共產國際在遠東活動遭到重挫。〈萊謝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關於在華工作的報告〉（1932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 年），第 13 卷，頁 85-86。

究較少從當時中共黨內路線分歧與忠誠問題，來解釋這起事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危機。第一，自立三路線後，中共黨內領導層對於革命路線產生分歧，中下層黨員無所適從。為解決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共產國際派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來華，藉此重新奪回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權。但這也導致黨內不滿的聲浪四起，國際派的掌權無法有效讓黨員信服，大批共產黨人因而出走或被捕「叛變」，共產國際在華組織亦屢遭破壞，革命事業陷入低潮。那麼，伍豪——也就是周恩來本人——會不會像顧順章與向忠發一樣「叛變」呢？想必這是當時不少共產黨員的擔憂。否則毛澤東（1893-1976）與潘漢年等人，也就不需要大費周章地替周恩來闢謠；第二，面對調查科的來勢洶洶，周恩來如何安定黨內人心？又是如何對國民黨進行反擊？同樣是值得深入探討的；第三，以往對顧順章家屬滅門血案的研究，雖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但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藏有此案一手檔案，相信透過這些材料能較清楚釐清此段歷史真相。值得一提的是，調查局係國民黨「中統」在臺重整機構，因長期與中共鬥爭，進而累積大量珍貴檔案。

調查局職責是負責緝毒以及大陸工作等，屬於情治單位，這導致一般人很難進入查閱檔案。加上經費缺乏，大部分檔案仍為紙本，又礙於敏感性與保密性，僅能手抄或電腦打字，讓研究相對困難許多。但材料的難以取得，不代表無法研究。目前仍有學者利用調查局檔案，完成不少成果。例如郭華倫的《中共史論》⁴、王健民所撰《中國共產黨史》（原名《中國共產黨史稿》）⁵與陳永發所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⁶等。這三套著作是當今臺灣中共黨史研究經典，不過皆屬於通史類，因此對顧順章「叛變」前後中共黨內路線紛爭，以及後續影響討論有限。尤其是伍豪事件牽涉時間較長，是中共黨史中意外的插曲與日後周恩來的政治危機。

⁴ 郭華倫，《中共史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年），第1-4冊。

⁵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第1-3冊。

⁶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冊。

中國大陸則因為政治敏感性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官方對於伍豪事件已有既定的論調。例如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室聯合發表在《中共黨史資料》中的〈「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⁷一文。文章稱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炮製，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為江青（1914-1991）反革命集團利用，拿來誣陷和攻擊周恩來同志的一樁我黨歷史上罕見的反革命陰謀事件」。⁸又，金沖及係中國大陸周恩來研究的權威，在他主編的《周恩來傳》一書中，形容伍豪事件是江青等人利用來打擊周恩來的「鬧劇」。⁹而中國大陸學者基本也依循這樣的說法，較難有更深入的突破。

本文嘗試從伍豪事件切入，跳脫過往中共黨史的條條框框，以調查局所藏檔案為核心，來討論周恩來的危機應對，進一步分析當時中共黨內的政治危機與路線問題。由於國際派的上臺，這段時期被中共視為「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¹⁰在王明「錯誤」的領導下，周恩來如何調和黨內同志對革命路線的分歧，又如何應付來自國民黨各方面的挑戰，以及日後來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威脅？這都考驗著周恩來的政治智慧。

貳、顧順章案前後黨內忠誠問題

立三路線¹¹是中共黨史上一次重要的分水嶺。1930年中原大戰¹²的爆

⁷ 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5輯（1983年7月），頁7-17。

⁸ 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頁7。

⁹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4卷，頁1734。

¹⁰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上冊，頁307。

¹¹ 立三路線被中共官方稱為「『左』傾冒險錯誤」。由於李立三的冒進，使得中共遭受到嚴重的打擊，爾後的六屆三中、四中全會，就是為解決立三路線所帶來影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頁299-307。

發，讓實際掌握黨內權力的李立三（1899-1967）產生了錯覺，認為當前形勢大好，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希望奪取一個中心城市，藉此達到「一省與幾省重要省區的首先勝利與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而武漢就成為當時紅軍所必須奪取的重鎮。¹³為了不做「革命發展中的尾巴」，為了不成為「斷送革命的罪人」，全國共產黨組織在李立三的嚴令下動員起來，由彭德懷（1898-1974）率領的一支紅軍甚至攻陷長沙。¹⁴為此，李立三被支持者尊為中國的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1870-1924）¹⁵，在志得意滿之餘，他抨擊那些反對者：「你們必須要麼遵守共產國際的決議要麼表示忠於中國革命。」李立三這樣的言行，看在莫斯科的眼裡是「他在犯錯誤，而且是危險的錯誤」。為了改正這樣的「錯誤」，共產國際毫不客氣地對中共中央挑明地說：「不執行共產國際決議就不能保持對中國革命的忠誠。」¹⁶但好景不常，長沙很快便被湖南省主席何鍵（1887-1956）所率領的部隊收復，革命情勢也不如李立三想像中的樂觀。

共產國際對中共早期革命佔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正確的」國際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人所信仰的，誰控制與莫斯科溝通的渠道，誰就能掌握話語權。立三路線的執行，不過是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在中國付諸實行，是一種以城市工人暴動配合軍隊的進攻來奪取全國政權的模式。但這樣激進的

¹² 北伐戰爭結束後，閻錫山（1883-1960）、馮玉祥（1882-1948）、李宗仁（1891-1969）等人認為蔣中正（1887-1975）利用裁軍議題削弱地方實力，導致雙方於1930年5月至10月爆發軍事衝突。由於戰爭地點主要位於河南、山東、安徽等地，故稱「中原大戰」。

¹³ 〈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冊，頁121-122。

¹⁴ 〈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1930年8月6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頁234-235。

¹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1931年）〉，《展望與探索》卷8期12（2010年12月），頁124。

¹⁶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年），第12卷，頁197。

舉措也遭到黨內不少同志反對，如工運領袖何孟雄（1898-1931）、羅章龍（1896-1995）等人。為奪回中共的控制權，為導正中國革命的路線，共產國際將人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與瞿秋白（1899-1935）派遣回國，因此有了六屆三中全會¹⁷的召開。

不過六屆三中全會並未解決立三路線所帶來的路線分歧，反倒是引起新一輪的政治危機。周恩來與瞿秋白輕忽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憤怒，並未對李立三有過重的處分，言行間竟也成為立三路線的支持者。尤其是瞿秋白，「在這個時候竭力要把共產國際的路線同李立三的政策聯繫起來，可以說是要背著黨實現轉折，而不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消除李立三主義」，希望營造出「一切都正常，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然而這樣的「調和主義」引起黨內同志不滿。¹⁸在路線衝突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米夫的來華似乎讓中共看見一絲曙光。1931年1月7日，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所主導的六屆四中全會，應該是最「正確的」，最能表現出國際意識的會議，但事實顯然不是如此。六屆四中全會在爭議中拉開帷幕，短短數小時的會議決定了中共未來發展的方向，以王明（1904-1974）為首的留蘇學生上臺了，但這也開啟了新一輪的黨內政治風暴。

所謂的黨內忠誠，是指意識型態政黨對於主義、對於革命路線的信仰。有了黨內忠誠，才有所謂叛變問題。代表「正確的」國際路線，是不容被質疑與挑戰的，只是執行的人或方法不對，而非國際路線有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黨必做到無條件地忠實於共產國際，這也就是忠實於中國革命」，任何對共產國際造成危害的局面都必須「粉碎和根除」。

¹⁷ 1930年9月24日至9月28日，由周恩來與瞿秋白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中批評了立三路線「不切實際」的估量，李立三被迫離開領導崗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頁307。

¹⁸ 〈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年），第10卷，頁82-83。

¹⁹正因為如此，從立三路線到六屆三中、四中全會，黨內反對派主要批評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等人，認為這些人曲解國際路線。而王明等人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奪取黨內領導權，因有了領導權才能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才能詮釋何謂「正確的」國際路線。

1931年1月17日的「東方旅社事件」²⁰，導致何孟雄等反對派被捕，最終遭到國民政府處決，是為「龍華二十四烈士」。整起事件一直有傳聞是王明派人向國民黨告密或是知情不報，希望藉敵人之手剷除黨內異己。不少被捕中共黨員口徑前後一致將矛頭指向王明，如政治局委員徐錫根（1903-？）提到：「因此何夢雄〔何孟雄〕等堅強的領導反立三路線運動，得到全體群眾的擁護，這堅強偉大的力量，嚇倒陳韶玉〔王明〕等不放心，馬上採取了可恥而悲慘的告密了，以後有何孟雄等二十餘人的犧牲。」²¹又如中央委員余飛（1902-？）稱：「陳韶玉們排除異己的手段，真成了空前絕後，他們不在理論上和組織上征服別人，他竟動員特務隊或派人告密以對付異己同志，尤其是最得群眾信仰和擁護者的領袖，何夢雄、林育南（1898-1931）的被捕，陳郁（1901-1974）的被調赴莫斯科讀書，是他們頂刮刮〔呱呱〕的成績。」²²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這些中共黨人被捕時間前後不同，在黨內地位也有所異，但供詞說法竟有驚人的雷同，認

¹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0卷，頁106-107。

²⁰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強力主導之下，王明等留蘇學生被扶上領導層位子，這樣的結果造成黨內不少同志的強烈不滿。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對派，在上海東方旅社開會，因中共「叛徒」王掘夫（又名唐虞）的告密，導致這些人遭國民政府逮捕，並隨即在2月7日處決。〈何孟雄生平表〉（1931年1月13日），《何孟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42-243。

²¹ 〈前共黨中委徐錫根宣言〉，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頁59。

²² 〈前共黨中委余飛告共黨同志書〉，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頁69。

為王明利用告密手段來打擊黨內異己，這顯示著此時中共面臨巨大的分裂危機。

不僅如此，王明還向共產國際匯報稱：「由於奸細出賣，何孟雄全部招認了，此外他還向警察局長寫了申請，請求歸還被捕時抄走的全部材料，因為他想寫詳細報告。」²³王明這段話暗指何孟雄已經向國民黨「自首自新」，企圖將「麟水」潑向那些被捕同志，因此真實性如何有待檢驗。在龍華監獄裡，中共黨支部書記曾請示王明，「請求告訴他們黨內情況並作出關於如何對待反對派的指示」，但卻得到「讓他們別把反對派列入自己的組織，而要盡量通過個別誤入歧途的人做解釋工作把他們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的批示。²⁴顯然這些反對派無法受到黨中央的信任，王明在營救被捕同志問題上也似乎沒這麼積極。這也或許像列寧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必須領導黨。要領導，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動搖，不要再花時間去說服動搖份子，去同有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派別內的鬥爭。」²⁵

東方旅社事件後，國民黨無意間幫王明解決了一次黨內分裂的隱憂。羅章龍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²⁶頓時成為中共反對國際派的最大陣營。但誠如毛澤東所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²⁷革命是需要流血、需要資源的，這些留蘇學生控制中共領導權，且又能直達天聽，手握與共產國際溝通渠

²³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紀錄〉（1931年2月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0卷，頁37。

²⁴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紀錄〉，頁37-38。

²⁵ 列寧，〈取消取消主義〉（1909年7月11日〔24日〕），《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卷，頁265。

²⁶ 為了抵抗國際派的黨中央，羅章龍於1931年1月31日成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另立黨中央，拒絕承認六屆四全會的合法性。參閱張永，〈六屆四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期1，頁48-71。

²⁷ 毛澤東，〈湖南農民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卷，頁17。

道，更主管著資源分配權。羅章龍無論有如何崇高的理想，無論有多麼合理的解釋，當「非常委員會」成立那一刻起，便註定失敗的命運。因為這看在共產國際眼裡就是分裂黨，破壞黨內團結，而這是無法被允許的。原先各地支持「非常委員會」的黨組織，多半在缺少資金情況下，轉向國際派的中央靠攏，「羅章龍的代表被從奉天和香港趕了出來，他們沒有取得任何成果」。²⁸王明也在周恩來的幫助下，逐步收攏反對派，藉此確立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與權威性。²⁹但這種作法無法讓黨內同志誠心信服，這一點從顧順章事件後中共黨內的「叛變」問題可以說明。因為，「四中全會後我們有很多人被捕。光上海一地我們就平均每天損失三人」。³⁰共產國際遠東局也評估著，「我們面臨出現新的叛變的危險」。³¹這顯示著中共面臨極大的生存危機。

更致命的是在 1931 年 4 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並隨即「叛變」，同時供出大量共產黨各地組織情報。加上顧順章是中共特科領導人之一，掌握大量黨內機密，因此所帶來的危害則不容小覷。調查科負責人徐恩曾（1896-1985）也曾表示：「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的一年（1931 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³²確實，這道神秘大門被調查科特務所開啟，而顧順章正是這把

²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 年 2 月 22、23、25、28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0 卷，頁 126。

²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頁 244。

³⁰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1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0 卷，頁 280。

³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1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0 卷，頁 185。

³² 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55；U. T. Hsu, *The Invisible Conflict*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84.

鑰匙。兩個月後，牛蘭與向忠發的被捕同樣是顧案的延續。

黨內同志無法真正信服六屆四中全會新的領導班子，畢竟這場會議本身合法性就遭到質疑。在無所適從情況下，中共黨內產生了不少「叛徒」，這些人或是「自首自新」或是被捕「叛變」。例如在 1931 年 1 月 22 日，江蘇省委關於黨四中全會的決議材料，調查科隨即在「中華民國廿年參月廿四日收到」。³³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王鳳飛（1903-1932）在 1 月 26 日寫給黨中央關於反四中全會的意見，調查科也在「中華民國廿年五月壹日收到」。³⁴調查科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取得中共黨內材料，這有幾種可能，第一是黨內「叛徒」所提供；第二是國民黨特務潛伏於中共黨內；第三則是中共組織遭破壞所查獲。

此外，調查科在 1933 年將 300 位中共「轉變」份子自白編撰成《轉變》一書，根據本書，這些人身分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如向忠發、顧順章、徐錫根——到最基礎的一般黨員皆有。其被捕或自首時間不一，黨內職位也各有所異。在這些自白或宣言中，不難發現多半是對留蘇學生或王明有所責難跟批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周恩來的指責或不滿的聲浪，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這就顯得十分有趣。³⁵因為周恩來無論從黨內資歷或是個人聲望，都遠遠超過年輕氣盛的王明。再者，周恩來是中共特科的創始人，也是實際控制者。中共特科有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衛中共領導人懲戒「叛徒」。那麼，東方旅社事件周恩來難道沒有責任？加上黨內不斷出現的「叛徒」，周恩來不用負責？但顯然黨內同志並沒有把矛頭指向他，而這或許就是周恩來政治手腕高明之處。

³³ C.Y.江蘇省委，《江蘇省委關於四中全會的決議》（1931 年 1 月 23 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31/806/12470。

³⁴ 王鳳飛，《王鳳飛反四中全會的意見》（糾 124 號）（1931 年 1 月 26 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62.3/23/14902。

³⁵ 參閱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 年 12 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

加上牛蘭夫婦的被捕，讓共產國際在華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導致中共「再也沒有收到任何材料。黨根本不知道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的決定和決議等，這給中央同志們的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且「由於經費困難〔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嚴重癱瘓」。³⁶緊隨牛蘭之後，向忠發也於 1931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被捕，「向初尚抵賴，後經說服，遂自供周恩來之住址」。³⁷但向忠發的自白並沒有替他獲得一條生路，反而隨即遭到國民政府處決。總書記的被捕殺，想必對黨內同志造成不小衝擊。起初中共中央下令各地黨組織展開為向忠發悼念活動，藉此形塑國民黨殘害黨內同志以凝聚團結。³⁸但隨著向忠發「叛變」消息真相逐漸明朗，中共中央的態度也趨於保守。

調查科特務在顧順章的協助下，於全國展開大搜捕，國民黨本想利用此次機會一口氣逮捕中共領導層，尤其是像周恩來等重要人物。但潛伏在調查科的共產黨員錢壯飛（1895-1935）第一時間將顧順章「叛變」消息轉達中共中央，讓周恩來得以有時間將各機關人員進行轉移，而免於遭受毀滅性打擊。³⁹由於沒有如願逮捕到周恩來，使得國民黨十分懊惱與惋惜。身為調查科總幹事的張冲，「人稱小諸葛，鬼才出眾」，⁴⁰想到利用從中共「轉變」份子口中得知伍豪係周恩來一化名的訊息，設計了〈伍豪等

³⁶ 〈萊謝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關於在華工作的報告〉（1932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頁 84-86。

³⁷ 〈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 年 12 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頁 335。

³⁸ 《中共中央關於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逮捕向忠發同志宣言》，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97/284/7492，1931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關於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同志》，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25/804，1931 年 6 月 26 日。

³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頁 149。

⁴⁰ 張文口述，萬東整理，《特工生涯——232 號戰犯張文（張國棟）口述實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60。

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同時可以轉移九一八事變後國內輿論的焦點。

主要是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學潮風起。以上海來說，各校學生聯合組織抗日救國會，在各地呼籲國人抵制日貨，不少激進份子便開始攻擊在華日本人，搗毀日本商家、汽車，並向租界日本駐軍投擲石塊，此舉引起日方的憤怒，揚言將派海軍陸戰隊驅離抗議群眾。⁴¹在中日雙方高度外交緊張下，國民政府為避免事態擴大，於 1931 年 11 月 5 日，電令時任上海市長張群（1889-1990），請他務必將學生抗議運動局部化避免事態擴大。⁴²然而在 12 月 9 日，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遭受不明的人身攻擊，導致一人重傷送醫，一人受傷失蹤，許多代表亦行蹤不明，此事讓學生譁然。當日由光華、大夏、復旦與上海交通大學等校學生組織、一批約 4 千餘人的抗議隊伍，包圍上海市政府要求嚴懲兇手。⁴³在此危急之際，張冲立即飭令下屬黃凱，指示他說：「領袖為此事大發雷霆，指責你膽大妄為抓人，限你在幾小時內把張市長救出來，不准打人，不准開槍。」⁴⁴但黃凱表示對此事不知情，張冲則語帶不滿的回答：「你是我們系統在上海的最高負責人，對此事不明底細，豈不是笑話，你趕緊去找顧順章」。⁴⁵在後續處理過程，根據黃凱的回憶：

我派交通找顧順章，找來找去找不到，打電話也聯繫不上，老蔣限

⁴¹ 〈張群致國民政府電〉（1931 年 10 月 18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 5 輯第 1 編政治(四)，頁 255。

⁴² 〈行政院為防止上海各大學抗日會代表來南京活動致首都衛戍司令部箋函〉（1931 年 11 月 5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1 編政治(四)，頁 274-275。

⁴³ 〈張群致蔣中正等密佳電〉（1931 年 12 月 9 日）、〈張群致國民政府等密蒸電〉（1931 年 12 月 10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1 編政治(四)，頁 277-278。

⁴⁴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中統特工秘錄》（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1991 年），第 45 輯，頁 8。

⁴⁵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頁 8。

時快到，我急得沒命，我宣布要顧順章在3小時內釋放學生，如敢違限，嚴懲不貸。這時我急中生智，想出一條把張群市長救出重圍的妙計。我們組織了一支學生隊伍以特派員辦公室十多人為核心……這批喬裝打扮的學生從包圍著外層到內層打開通道，王斌一馬當先衝上樓，一把拉住張群市長，低聲說：「是自己人。」張群仔細看了王斌面孔，已放心。但此舉危險至極，王斌險些被張群的衛士打死。我們把張群救出重圍送上汽車，轉移到安全地區。⁴⁶

事後顧順章告知黃凱：「這件綁架案，是得到最高當局同意的，八名學生被看管在曹家渡小船上，現在已全部釋放。」⁴⁷但也因此事的緣故，導致張群請辭上海市長，改由吳鐵城（1888-1953）接替，以平息國內輿論。加上1932年1月28日，日本為了轉移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輿論的焦點，在上海製造軍事衝突，是為第一次淞滬會戰，其中十九路軍英勇抗日形象深植人心。在國內抗日情緒高漲之際，就導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政策備受批評。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從2月16日至22日，接連七天在上海各大報刊登一則令人震驚消息，斗大標題寫道：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告退出共產黨，已覺悟共黨必將陷我民族於絕境，前被誘惑而加入共產黨之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近因覺悟共產黨所取手段，足以危害中國抗日力量，結果必將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特在各報刊登啟事，宣告退出。⁴⁸

當時最大的《申報》亦連續兩天登出，內容全文如下：

⁴⁶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頁8-9。

⁴⁷ 蔣中正認為：「近來愛國運動中，不少反動份子乘機搗亂，藉圖擴大風潮，搗亂秩序，適足以危害黨國，亦所以殘害青年。為此應令各就地研求應付具體方法，勿使越出範圍。」因此蔣中正派人與上海青幫領袖杜月笙協商，請他協助政府「控制」學生運動。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縣：國史館，2004年），12，頁453，1931年12月10日條；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頁9。

⁴⁸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告退出共產黨〉，《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2月22日，第1張第4版。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採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⁴⁹

中共黨內不少同志知道伍豪係周恩來代號，這則啟事的出現代表周恩來要「叛變」脫黨？「當時皆念伍氏必為顧順章之第二，又無疑義故東避西藏，大起恐慌」。⁵⁰如果事實為真的話，那麼中共可能會面臨分崩離析狀態，而這正是張冲所想要的結果。頓時間社會輿論開始猜測這位伍豪究竟為何方神聖，有些人直接猜測：「此項廣告，亦非伍等所登，實係某方所託名登載，蓋欲藉此誘捕伍等也。緣伍豪本為共黨中之中堅份子，人頗幹練，性格殘忍。去冬，姚主教愛棠邨謀斃數命之慘案⁵¹，伍實為其主犯正兇，故當局亟欲捕伍，歸案法辦。」⁵²也有人斷定伍豪為「現在江西蘇維埃政府之最高軍事委員」。⁵³同時國民黨也利用〈伍豪脫黨啟事〉來加強內部反共宣傳教育，在 1932 年 2 月 18 日在天津特訓的電報中提到：

滬共黨重要份子伍豪等二百四十人，共同啟事脫離共黨，增加抗日力量，其聲明謂：「中國共黨現採手段，結果必為日本傀儡，該黨

⁴⁹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上海），1932 年 2 月 20、21 日，第 3 版。

⁵⁰ 浪花，〈共產黨要人伍豪脫離共黨之內幕與翻戲〉，《上海報》（上海），1932 年 3 月 25 日，第 2 版。

⁵¹ 指顧順章家屬被殺一案。

⁵² 狂瀾，〈伍豪尚未離共黨〉，《金鋼鑽》（上海），1932 年 3 月 15 日，第 2 版。

⁵³ 浪花，〈共產黨要人伍豪脫離共黨之內幕與翻戲〉，《上海報》（上海），1932 年 3 月 25 日，第 2 版。

所採路線乃蘇俄利用政策。蘇俄聲聲反對帝國主義，已乃與日本妥協，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係欺騙，本良心覺悟決脫離。」⁵⁴

國民政府將此次事件廣為宣傳藉此凝聚內部團結，說明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社會，強化剿共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同時希望利用周恩來在共產黨中的地位，進而影響那些潛伏在國民黨內部與地下活動的共產黨員，使其動搖轉向國民政府輸誠。這逼著許多共產黨員公開地說：「同志的叛變，完全是黨的工作遲緩所造成的」；國民黨方面則是認為：「我們可以斷定本黨的自首政策，不僅能夠在政治上、組織上摧毀共黨，而且更會在這一新的形勢下，得著更大的勝利。」⁵⁵

參、中共特科的改組與周恩來的應對

在顧順章「叛變」以前的中共特科有一套完善機制，「在黨內反對間諜和奸細並在敵人的組織和軍隊中進行破壞工作的機構」。⁵⁶由於顧順章曾接受蘇聯格伯武⁵⁷訓練，因此特科在他的領導下，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具體工作如下：

⁵⁴ 「天津特訊滬共黨重要份子伍豪等二百四十人共同啟事脫離共黨（1932年2月18日），〈各方民國21年2月往來電文錄存（一）〉，《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16-010108-0189-074。

⁵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0.01/7455c.3/009749，頁65-66。

⁵⁶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148。

⁵⁷ 在沙皇時代，布爾什維克黨人為了抵抗憲兵與警察的逮捕，以及防止叛黨份子的活動，因此成立紅色保衛隊的組織。爾後隨著組織的擴大，遂改名為「非常委員會」，中文譯名為「契卡」。主要任務是為了鞏固布爾什維克政權，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待政權穩固後，任務性質改變，又更名為「格伯武」。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195。

該部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發奸細和「積極」與之作鬥爭上。此外，該部還為中央的技術工作服務，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尋找住所，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黨、共青團和工會的中央全會服務，主管印刷所、文獻庫等等。特工部在工作中依靠相當可靠的關於敵人活動的情報，這些情報或者是通過派共產黨員到國民黨中擔任負責工作取得，或者是利用國民黨陣營中的一些負責同志的私人聯繫取得。中共特工部在國民黨的一些作戰崗位上有自己的情報員，他們事先告知國民黨對蘇區共產黨的行動計劃。⁵⁸

這也說明了中共特科對國民黨已有相當程度的滲透，這也使得在顧順章「叛變」後黨組織不致於全面瓦解。但是在工作上「主要缺點是把全部工作過分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當顧在武漢被捕並供出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時，其危害性就暴露出來了」。⁵⁹根據當時中共特科組織架構如下圖 1 所示：

⁵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頁 148。

⁵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 年 6 月 3 日），頁 148-149。

中央特務組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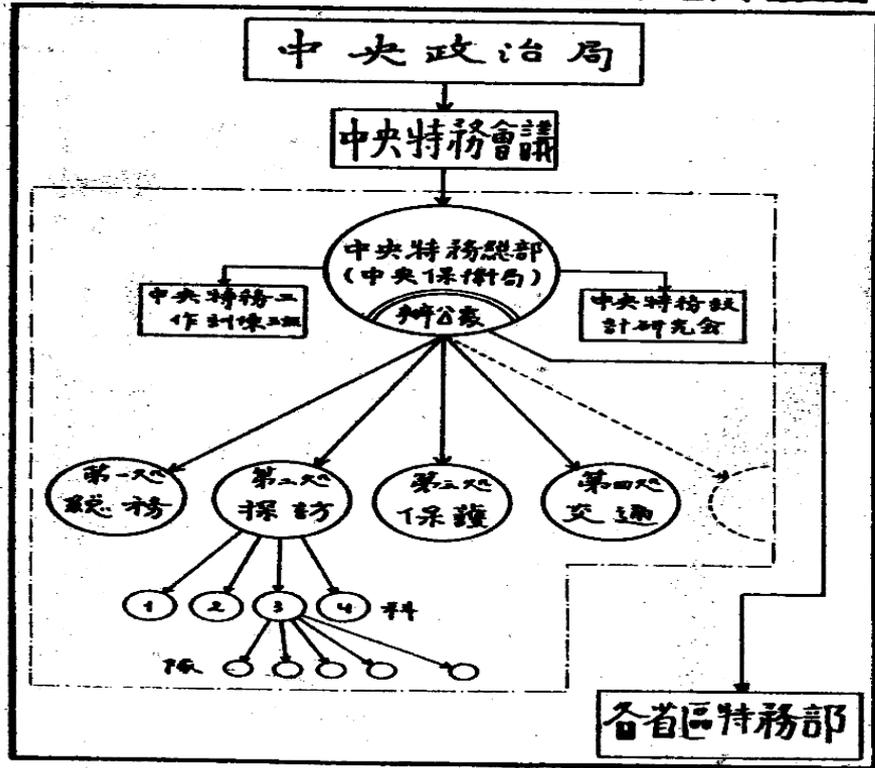


圖 1：中共特科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20-21。

中共的特務工作始於 1927 年的清黨，但初期尚無成果，直至 1928 年「他們覺得所處的環境極其危險而惡劣，所以他們為防禦敵人的進攻，和保護自己的安全計，不得不仿照蘇聯格伯武的組織而正式建立特務工作」。中共的特務工作的任務是保衛黨的組織安全和黨的政治路線發展，

因此可以說：「他們就是 C.P.⁶⁰的保險箱，他們一方面要幫助黨消滅敵人，一方面還要清除自己團體內自首或告密的害群之馬。他們又幫助黨在組織上檢查不良份子，如果黨發生特殊困難時，也均由特務工作負責解決。」⁶¹那麼，如果這個特務負責人本身就是「不良份子」，是「自首或告密的害群之馬」，所帶來的危害就可想而知。

顧順章在「叛變」後，「成立了出賣我黨〔中共〕的奸細和叛徒的特別小組，傳授與共產黨作鬥爭的方法」。⁶²中共黨內不少與顧順章熟識的人多半被捕，保衛黨安全的特科「已完全喪失能力」，「而且對〔共產〕黨本身構成巨大威脅」。⁶³「當時情況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關係的關係都切斷。」⁶⁴顧順章案是「黨在反間諜反間細鬥爭的轉折點」，⁶⁵周恩來在案件發生第一時間後便採取了這些措施：

（一）銷毀大量機密檔案，將主要領導人迅速轉移，並採取嚴密的保衛措施；

（二）將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查目標的中共幹部，迅速轉移至安

⁶⁰ 指中國共產黨。

⁶¹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186-187。

⁶²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128。

⁶³ 〈萊謝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關於在華工作的報告〉（193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93。

⁶⁴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上，頁127。

⁶⁵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149。

全地區或調離上海；

(三) 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係；

(四) 廢除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⁶⁶

為了應對這場危機，周恩來改組特務委員會，「由周恩來、廖程雲〔陳雲〕(1905-1995)、潘漢年、趙容〔康生〕(1898-1975)、鄭惠安(1903-1935)五人為委員，實際負責者為趙容」。⁶⁷特務委員會由周恩來親自領導，「這些領導人彼此不知道。每個科有獨立的機關、住處和接頭地點。這些科的機關大大縮減了。中央書記處機關和上海省委機關和工會機關以及某些省組織也大致同時進行了改組」。⁶⁸

由於有了周恩來的危機處理，使得「近來沒有發生較大的暴露以及部分地恢復和重建一些一度癱瘓的環節(聯絡)的這種情況判斷，可以認為，黨確實改進了自己的秘密工作」。⁶⁹同時中共也開始進行反擊。首先為了懲戒顧順章的「叛變」，中共特科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將顧順章妻子張杏珠及其家人「秘密施以殺害」。⁷⁰根據調查科所抓獲中共特科幹部王竹友向顧順章供稱：「請你原諒我，這不是我的罪惡，我是奉命執行的，在我得到你『轉變』消息後，周恩來立即召見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統統〔通通〕解決。」同時交代說：「這些皆是叛逆份子，或者反對周恩來命令的

⁶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8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117。

⁶⁷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⁶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149。

⁶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頁150。

⁷⁰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共產黨員。皆是奉周的命令執行的，執行的人大多數不知姓名，便糊裡糊塗把他們殺害了。」⁷¹這讓顧順章痛苦萬分，隨後他便在王竹友帶領之下到達家人被掩埋地點，位於上海法租界的愛棠村。在挖掘過程中，發現「地埋了四個沒有衣褲的大人，兩個女的兩個男的，每兩個顛倒捆在一起，一個頭頸和兩個腳紮在一起」，最後確認為顧順章太太以及妻舅等人。⁷²隨後調查科根據王竹友的指認，在各地展開挖掘工作：

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卅二號，及新聞路斯文里七十號，等四五處發掘，因為初次的順利英法當局不再有阻撓情事，反之且竭力協助，但到先後掘出三四十具被周恩來指揮王竹友等殘害的屍體後，租界當局要求勿再發掘，因為這件已使國際方面都有了影響，這是使英法當局在管理租界方面最失面子的事情，他們允以後隨時接受我們的要求，協助防制共黨的活動，於是我們對這件鬧動世界的共黨殘殺同黨停止進行。⁷³

「上述三四十具被害人物中除顧之全部家屬外，還有許多共黨中因對不滿意周恩來等行動的異己」。⁷⁴家人的遇害讓顧順章悲痛萬分，他隨即在 1931 年 11 月 29、30 日，接連兩天在《申報》發出「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痛述著「共黨首要周恩來、趙容等竟親下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遠近戚友等十餘人悉行虐殺，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餘元及價值三千餘元之田產單據亦被劫奪以去，以此殘酷獸行絕滅人道實為空前罕

⁷¹ 〈關於周恩來謀殺顧順章全家案始末〉，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⁷² 〈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⁷³ 〈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⁷⁴ 〈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有之慘案。」⁷⁵啟事如下圖 2：



圖 2：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

資料來源：顧順章，〈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1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這起滅門血案在當時造成不小轟動，其中除了懲戒顧順章外，周恩來更以此告誡黨內同志背叛組織的下場。不僅如此，中共紅隊⁷⁶隨後也開始「處理」那些背叛黨組織的人，以及對調查科展開報復。1932 年 10 月 25 日調查科上海閘北區分區主任曹伯謙遭紅隊隊長鄭惠安率人擊傷左眼。

⁷⁵ 〈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2 張第 6 版、1931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⁷⁶ 紅隊，全稱為「紅色恐怖隊」，主要任務是保衛黨領導機關的安全，打擊「叛徒」與對付「奸細」，必要時也以綁架勒索贖金，藉此籌措黨內經費。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 年 7 月 20 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 189-190。

1933年4月11日，中共「轉變」份子雷達夫遭紅隊槍殺，在此之前調查科幹員王斌同樣被潘漢年擊斃於路口街角。6月14日調查科上海區負責人史濟美（1906-1933）與鄺惠安率領的紅隊展開槍戰，史濟美最終身中七槍而亡。接任史濟美職務的黃永華，在上任不到兩個月隨即遭紅隊刺殺在上海雲南路大中華飯店。這些案件的發生，「一時共匪暗殺氣氛極濃威脅性殊甚」。⁷⁷

鑑於顧順章案後的局勢，中共各地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大量人員遭捕，導致內部人心浮動，「儘管遇到異乎尋常的恐怖，儘管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被殺害，黨仍處在半地下狀態，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來從組織上鞏固地下機關」。⁷⁸對此，張冲認為可利用此點對中共進行打擊，他囑咐黃凱說：「中共經濟困難，可能有許多黨員動搖，可以試用周恩來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脫黨啟事。」由張冲起草這份啟事的內容，黃凱負責派人送至上海各大報社刊登，因此就有那則〈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⁷⁹整起事件的揭發，還是因為黃凱於1953年遭中共當局逮捕時所供出，⁸⁰他在獄中交代說：「張冲在抗戰以前悠長歲月中，是蔣光頭的主要幫兇，我又是他的主要幫兇。他親筆起稿，寫伍豪啟事……遍登中外各大報一星期，絲毫未達到預期的效果。」⁸¹

當時周恩來曾找中共一位地下黨員黃慕蘭（1907-2017）進行商討，根據黃的回憶稱：「自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在四處造謠，說他（周恩來）已經叛變自首了，問我能用什麼技巧而有效的方法替他闢謠，揭穿敵人這

⁷⁷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⁷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頁129。

⁷⁹ 黃凱，〈我在中統十七年〉，《傳記文學》卷61期6（1992年12月），頁85。

⁸⁰ 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頁9。

⁸¹ 轉引自曾憲新，《伍豪事件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5。

種卑鄙無恥的伎倆。」⁸²黃認為可以請她的律師男友陳志皋，由他代伍豪發表啟事，用以澄清兩個伍豪為不同人。周恩來甚感滿意，將此事交由黃慕蘭處理。黃立即與陳志皋商討應對之策，陳則認為：

能為《紅旗》的撰稿人辯護，是非常光榮的，我決不推託（他很欽佩伍豪寫的文章，但那時還不知道就是周恩來），但是照這樣的做法，啟事一旦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南京政府肯定會追究此事，向我查問：是誰介紹認識這個伍豪的？或是誰代表伍豪委託你代登這個啟事的？我可怎麼回答呢？先別忙，讓我再仔細考慮考慮，想出一個既能公開闢謠，又萬無一失的安全辦法來。⁸³

另一方面，〈伍豪脫黨啟事〉發出後，潘漢年便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因為《申報》乃當時中國第一大報紙，影響之廣不言而喻。先是由潘漢年偕同當時著名的教育學家陶行知（1891-1946），同《申報》負責人史量才（1880-1934）商請，在〈伍豪脫黨啟事〉發布後的隔日，即2月22日，在《申報》上刊登另一條啟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⁸⁴

這則啟事與〈伍豪脫黨啟事〉前後矛盾，間接否認兩則啟事的伍豪非同一人。人們見到此啟事，「知此中所云伍豪送來之啟事原稿，必為另一啟事」。⁸⁵此外，根據當時人在中共特科工作李一氓（1903-1990）的回憶：

經過大家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國租界巡捕房律師陳志皋，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啟事。但陳說他雖然在巡捕房工作，總是中國

⁸²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年），頁116-117。

⁸³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頁116-117。

⁸⁴ 〈伍豪先生鑒〉，《申報》（上海），1932年2月22日，第4版。

⁸⁵ 徐行，〈追記滬戰聲中一件秘事：伍豪並未脫離共黨（上）〉，《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3月22日，臨時專刊，第2版。

人，出面不方便。國民黨要是找到他，他難以解釋。他建議我們找一個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個緊要啟事。⁸⁶

潘漢年立即前往尋找位於上海租界區的著名法國律師巴和，並商請用他的名義登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啟事全文如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 243 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 243 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有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 41 號 6 樓 5 號。

電話：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號⁸⁷

周少山是周恩來的另一個別名，這則啟事不用伍豪的名字，否認前面脫黨啟事的真實性；一方面巴和為上海頗著名的律師，這則聲明不僅權威性強，加上他是法國人，南京當局也莫可奈何。巴和律師的這則啟事，讓調查科特務感到十分挫折。〈伍豪脫黨啟事〉登出後，「哪知當毫無反響，好久無人來自首，相反《申報》卻刊出了一位大律師代表伍豪發表的聲明」。巴和律師在刊登這則啟事前，調查科幹員季源溥（1906-1979）曾警告史量才不准登出，史量才則認為：「廣告是營業性質，何況從法律觀點來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應該聲明的。」⁸⁸關於巴和律師發表的啟事，負責聯絡的黃慕蘭回憶提到：

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是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

⁸⁶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94。

⁸⁷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2 年 3 月 4 日，第 3 版。

⁸⁸ 黃凱，〈我在中統十七年〉，頁 85。

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伍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二月份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那個啟事中那些反蘇反共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刊登了反駁的文章。⁸⁹

其實在巴和代周少山登啟事前，毛澤東就曾試圖消弭整個事件所帶來的風波，於當年的2月下旬發出布告：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登載伍豪等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蔑」。⁹⁰

在後來對日抗戰前的國共談判中，張冲與周恩來分別代表國共兩黨，他們在西安初次見面時，周恩來首先對張冲伸出友誼之手，說：「歡迎，歡迎，我們終於見面了！久聞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見果然年輕有為。」張冲則面帶羞澀的回道：「不敢，不敢，淮南過去對恩來先生多有不恭，實在慚愧，還請多多包涵。」周恩來笑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不是走到一起來了嗎？還是向前看吧！」「是的，是的，淮南將恪守職守，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⁹¹在聽完張冲說完這些話後，想必周恩來還是不明白為何要表示歉意，他應該萬萬沒想到眼前這個人，就是當年「伍豪脫黨事件」的設計者，更想

⁸⁹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頁118。

⁹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上卷，頁365-366。

⁹¹ 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學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936-937。

不到這起事件在未來會引起另一場政治風波。

肆、伍豪事件的政治餘波

說到伍豪事件的發展，真正發酵乃是幾十年之後的事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曾利用這個案件來打擊周恩來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亦稱「文革」，是一場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模式，來取代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間，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頂峰，各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成為最忠誠的支持者。身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以及張春橋（1917-2005）、姚文元（1931-2005）和王洪文（1935-1992）是所謂「四人幫」，他們則成為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⁹²

為了奪取核心權力，「四人幫」鼓勵寫檢舉信，整理各時期報刊、檔案等方式，大抓「叛徒」、特務、裡通外國份子、變節份子，並以極端手段來強迫這些人承認自己有「嚴重問題」，造成各地人心惶惶。⁹³自1967年5月中旬起，北京街頭出現幾則顯眼的大字報與標語，內容稱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同時也提到「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批評周恩來是「老保」，總是保那些「壞人」，加上周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⁹⁴成員的論調截然不同。⁹⁵在全國掀起一鼓「抓叛徒」風潮中，南開大學學生在查閱舊報紙時意外發現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這讓一直苦於抓不到周恩來把柄的江青如獲至寶，

⁹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796-799。

⁹³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4卷，頁1757。

⁹⁴ 1966年5月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其成員有：組長陳伯達（1904-1989），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王力、關鋒（1919-2005）、戚本禹（1931-2016）、姚文元等。設立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後來逐步不受約束，成為一個權力龐大的機關。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下冊，頁762。

⁹⁵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4卷，頁1732-1733。

她立即轉呈給毛澤東，藉此逼周恩來對此作出交代。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周恩來是他們在政治發展上的障礙。5月18日，江青將學生送來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轉送給林彪（1907-1971）、周恩來、康生等人，藉此強化這股「炮打周恩來」的浪潮。⁹⁶5月19日，周恩來在給江青的信箋中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加以否認，告知那是國民黨特務偽造的。當天周恩來親自查閱由工作人員從北京圖書館借回當年上海的各大報紙，將其中有關的報導編成《大事記》。《大事記》時間從六屆四中全會算起，截至1932年2月為止。隨後他又連夜寫信給毛澤東，將編撰的《大事記》附上，替自己作一番政治交代。⁹⁷但此時毛澤東的態度卻很曖昧，批示將揭發材料「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⁹⁸此舉不僅對周恩來有震懾效果，也讓他心裡產生芥蒂。

周恩來原本寄望由毛澤東來替自己作澄清迅速了結此案，但事與願違。現實發展非但沒有還他清白，毛澤東還將材料交由「中央文革小組」存照，這讓周恩來感到十分心寒。江青也因有了毛澤東給予這支「尚方寶劍」更加有恃無恐，憑著握有周恩來的把柄來挾制周，處處為難他，並擺出「文革老闆娘」的姿態，對周恩來呼來喚去。不過這讓毛澤東看不過去，於是傳話給周恩來說：「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對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鬥。對江青，對的我支持，不對的我反對。你總理無非是有幾個條子存在她手裡，你就怕這個？」毛澤東的這段話確實道中了周恩來的心結，但也讓他有苦難言。⁹⁹

由於〈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直懸而未決，讓周恩來背負著政治的黑鍋精神負擔極大，非常希望毛澤東能高抬貴手放他一馬，因此在行動上

⁹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卷，頁85。

⁹⁷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16年），頁221-222。

⁹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頁85。

⁹⁹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4卷，頁1732-193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23、234-235。

無不處處表現出對毛的忠誠。¹⁰⁰雖說毛澤東本人曾多次替周恩來說明此事，除在 1968 年 1 月 16 日回覆北大歷史系學生〈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問題一事，批示提到：「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¹⁰¹同年 5 月 8 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中說：

敵偽的報紙也不能全信。像許世友（1905-1985）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啟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了解當時的歷史情況很不容易。這個「啟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為什麼只寫出一個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寫？有些幹部對歷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驚。¹⁰²

毛也曾為「投降派」下了這樣一番定義：

投降過國民黨就永遠忠實於國民黨，投降過共產黨就永遠忠實於共產黨，這個規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敵人抓住了，放出來了，登報了，但不一定永遠依靠敵人。他還參加長征，參加抗日嘛，沒有做過大壞事。一抓歷史，後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講投降是好事。

103

但事實上毛澤東一直拿這個問題挾制周，多次暗諷他為「投降派」。1975 年 8 月下旬，醫生為周恩來檢查身體發現一個較大的腫瘤，證實為膀胱癌轉移，病情嚴重惡化，並隨即進行手術。在手術前醫生們跟周恩來報告說，這是一次必須進行的「比較重要」的手術。¹⁰⁴為了「保持晚節」，周恩來不顧自身健康，在進入手術室前囑咐人拿來自己在 1972 年 6 月 23

¹⁰⁰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27。

¹⁰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 卷，頁 149。

¹⁰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 卷，頁 162。

¹⁰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 6 卷，頁 2484。

¹⁰⁴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個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79-280、291-292。

日的報告，《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紀錄稿，「將自己一個人關在衛生間裡，把該稿從頭到尾又審定了一遍，然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把這份報告發給全國各省區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用著顫抖的手在上面簽名，並註記時間地點：「於進入手術室，一九七五、九、二十」，最後握著鄧小平的手，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¹⁰⁵在此之前，周恩來也忿忿然的提到：「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的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的有投降派，那當然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十幾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¹⁰⁶由此可見，伍豪事件對周恩來內心造成多大的影響。

此外，當年處理伍豪事件當事人之一的陳雲也多次對此進行澄清與解釋，他於 1972 年 6 月 13 日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中對伍豪事件寫出書面發言，說：「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¹⁰⁷1981 年 11 月 8 日，陳雲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者專題座談會上，也提到要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前前後後說清楚。¹⁰⁸1983 年 1 月 23 日，陳雲又談到：

「伍豪啟事」發生在三十年代初我黨處於秘密狀況下的上海。過去，黨內知道這個啟事的人很少，知道這個啟事係敵人偽造的就更少，知道地下黨曾採取措施給予公開揭露的大概只有幾個人。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只知道報上登出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了解地下黨設法揭

¹⁰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下卷，頁 721；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 4 卷，頁 19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88。

¹⁰⁶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 年），下冊，頁 696。

¹⁰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年），下卷，頁 188-189。

¹⁰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修訂本）》，下卷，頁 324。

露這個陰謀的情況。¹⁰⁹

至此，伍豪事件所引起的風波逐漸落下帷幕。但直至 1976 年周恩來臨終時，對此事仍一直念念不忘。由此可見伍豪事件對周恩來影響之深。而當初設計此事件的張冲，應該也無法想到自己的一時之舉，會讓這位老對手深陷另一場政治風暴。

伍、結語

伍豪事件是國共鬥爭下的一次插曲，一次看似意外插曲，背後卻隱含著複雜的路線鬥爭問題。整起事件主要源自於顧順章的「叛變」，但這起「叛變」所體現的卻是中共黨內忠誠問題的嚴重性，這些被捕的共產黨人非但沒有「寧死不屈」，反倒是投靠自己眼中「階級敵人」的國民黨，有些人更站上反共的第一線，手上沾滿過往同志的鮮血。

這與其說是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不如說是意識形態解釋權與話語權之爭。共產黨人堅信俄國革命的經驗，希望以城市暴動的模式來奪取全國政權，立三路線不過是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但李立三忽略了中國實際的狀況，更輕忽了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使得自己落入狼狽的下場，立三路線更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李立三最後甚至被評為「一個不學無術的低能兒」，至此澈底由神壇跌入了谷底深淵。¹¹⁰

本該是為了解決立三路線遺留問題所召開的六屆三中、四中全會，卻進一步成為引爆中共黨內路線分歧的導火索。共產國際為了能澈底掌握中國共產黨，不惜以失去中堅的工運領袖為代價，硬是將王明等留蘇學生扶上領導層。其實這些工運領袖對比遠在莫斯科的留蘇學生更能貼近中國社會實際狀況，也由於領導層的衝突，讓中下層黨員更加無所適從，許多人為了生存所迫，不得不改變原有的革命初衷，造成不時有「叛徒」出現的

¹⁰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頁 366-367。

¹¹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1931 年）〉，頁 123。

傳聞。

政治身段非常柔軟的周恩來，在國際派上臺後為了鞏固黨內的團結，選擇服從六屆四中全會的安排。王明有了周恩來的支持，讓他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黨的狀況。但其實身為中共特科的創始人與領導人，顧順章的「叛變」於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再者，造成何孟雄被捕的東方旅社事件，正是由中共特科的「叛徒」王掘夫向國民黨告密所導致的。但顯然黨內同志並沒有將矛頭對準周恩來，王明反倒成為眾矢之的。由此可見周恩來有其過人之處，而王明則因為「歷史與地位關係」，讓黨內同志「都瞧不起他」。¹¹¹

不過也正因為有了周恩來的危機處理，才使得中共能挺過顧順章「叛變」後所帶來的生存危機。不僅如此，周恩來能在短時間內重整中共特科，對調查科展開反擊，將這些「叛徒」加以「制裁」與「鎮壓」，除了震懾國民黨外，更藉此告誡黨內同志背叛黨組織的下場。伍豪事件在當時不了了之，不過卻在幾十年後引起一場政治風暴，想必是張冲與周恩來無法設想到的。

此外，在筆者目前整理調查局檔案中發現，局內所藏有關於中共檔案佔絕大部分，「中統」自身發展的檔案多半已散失。又從這些中共檔案中看出，當時調查科早已熟悉中共在王明等留蘇學生上臺後的路線衝突。國民黨利用中共黨內這樣的紛擾，強化與健全既有的「自首自新」政策，使得大批共產黨人陸續變節。這讓中共意識到，「黨應時刻教育每個黨員以堅決為黨為階級犧牲決心，動搖逃跑，自首自新是黨的汙點，是最可恥的現象，我們堅決要消滅這一現象。」¹¹²黨內忠誠教育就是中共換來的「血

¹¹¹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續）（1931年）〉，《展望與探索》卷9期1（2011年1月），頁124。

¹¹² 閩粵贛邊省委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年10月15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15/12626。

意外的插曲與危機：周恩來對伍豪事件因應的研究

的教訓」。¹¹³

¹¹³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手稿原件，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1/815/10822。

徵引文獻

-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2年3月4日，第3版。
- 〈伍豪先生鑒〉。《申報》(上海)，1932年2月22日，第4版。
-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告退出共產黨〉。《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2月22日，第1張第4版。
-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上海)，1932年2月20、21日，第3版。
- 〈各方民國21年2月往來電文錄存(一)〉。《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16-010108-0189-074，1932年2月18日。
- 〈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9日，第2張第6版、1931年11月30日，第2版。
- 《中共中央關於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同志》。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25/804，1931年6月26日。
- 《中共中央關於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逮捕向忠發同志宣言》。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97/284/7492，1931年6月24日。
- C.Y.江蘇省委。《江蘇省委關於四中全會的決議》。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31/806/12470，1931年1月23日。
-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
-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5輯，1983年7月，頁7-17。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北

-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8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修訂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0、12、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一中統特工秘錄》，第45輯。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1991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1931年）〉，《展望與探索》卷8期12，2010年12月，頁119-128。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續）（1931年）〉，《展望與探索》卷9期1，2011年1月，頁107-127。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0.01/7455c.3/009749，頁65-66。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

- (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1/815/10822。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1-3冊。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
- 王鳳飛。《王鳳飛反四全會的意見》（糾124號）。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62.3/23/14902，1931年1月26日。
- 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 何孟雄。《何孟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狂瀾。〈伍豪尚未離共黨〉。《金鋼鑽》（上海），1932年3月15日，第2版。
-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2。臺北縣：國史館，2004年。
-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
- 徐行。〈追記滬戰聲中一件秘事：伍豪並未脫離共黨（上）〉。《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3月22日，臨時專刊，第2版。
-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年。
- 浪花。〈共產黨要人伍豪脫離共黨之內幕與翻戲〉。《上海報》（上海），1932年3月25日，第2版。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16年。
- 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學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張文口述，萬東整理。《特工生涯——232號戰犯張文（張國棟）口述實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 張永。〈六屆四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期1，頁48-71。

-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個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郭華倫。《中共史論》(全4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年。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曾憲新。《伍豪事件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年。
- 黃凱。〈我在中統十七年〉，《傳記文學》卷61期6，1992年12月，頁8-18。
-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年。
- 閩粵贛邊省委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15/12626，1937年10月15日。
-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20-21。
- Hsu, U. T.. *The Invisible Conflict*.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Unexpected Episode and Crisis: Research on Zhou Enlai's Response to Wu Hao Incident

Wei-Jie Lin*

Abstract

Wu Hao incident is an unexpected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 crisis in Zhou Enlai's political life. The whole incident is caused by Gu Shunzhang's "betrayal", leading to the arrest of a large number of Communists. Zhang Chong who was then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Investigation Section of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Kuomintang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 learned the information that Wu Hao was a pseudonym of Zhou Enlai from confessions of those Communists "turning themselves in and turning over a new leaf". To damage the loyalty of the Communist, Zhang Chong created the false appearance of Zhou Enlai leaving the Party to break up the Communist Party. How did Zhou Enlai deal with the crisis in the face of the threat from the Kuomintang? How was the Special Operations 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built to punish "traitors"? Actually, the whole incident didn't have much effect at that time but caused a political storm decades later. So, how did Zhou Enlai defend his integrity in his later years? All of these problems above a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Zhou Enlai, Zhang Chong, Gu Shunzhang, Loyalty, Special Agent

*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Received June 16, 2020; last revised October 17, 2020; accepted December 30, 2020